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33

2009年6月18日

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 專著《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緒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李慎明

一、關於《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 的總體框架

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立“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這一重大課題，2001年該課題又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現在奉獻在讀者面前的《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這本專著，就是我們課題組這幾年研究的最終成果。

需要說明的是，2005年上半年，中紀委駐中國煙草總公司紀檢組組長潘家華和電視政論片製片人劉奇光得知我們專著有了基本框架，便邀請我們一起先製作一部相關的電視政論片，這就有

了2006年上半年製作完成的《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八集DVD黨內教育參考片。¹ 這部政論片共五個小時左右，在內部發行後，引起較為強烈的反應。中央紀委和中央政法委有關部門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所屬單位觀看。一些省委中心學習組用一天時間專門觀看，座談討論，並發專文要求全省所屬單位組織觀看。一些單位說：在放映中，人們屏息靜氣，很少走動；原打算分兩個半天看完，但一放映前幾集，觀看的同志一致要求中午邊吃盒飯邊觀看，一氣看完；五個多小時中，一些煙民也沒顧到場外“釋懷”；有的還自動組織召開座談會，暢談觀看體會。之後，解說詞發表，在社會上甚至在國外也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中國社會科學書店總經理黃德志還告我，有的讀者特地從外地坐飛機趕到北京來尋找片和購買解說詞。2007年10月，由我帶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俄。10月9日，俄羅斯科學院副院長涅基別洛夫院士代表俄羅斯科學院主席團在“第二屆中俄社會科學論壇”開幕式上講話。他特別地指出：“《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課題組，以嚴謹地的科學態度，分析了蘇聯解體和蘇共滅亡的原因及歷史教訓，得出了不少有勇氣和警示性的結

¹ 總撰稿：李慎明（署筆名：肖黎）。撰稿：李小寧、葛幼力、邱建、郝一星。

該片顧問：陳奎元、張全景、劉峰岩、鄭科揚、李慎明、全哲珠、杜學芳、李成仁、馬俊清、蔣振雲、李意珍。

總監製：李本剛、肖建國、周殿富、王京生、陳之驊。

總策劃：潘家華、朱錦昌、邢世傑、胡馳、邵中和、陳君、劉奇光。

理論提供：李慎明、陳之驊、吳恩遠、邢廣程、李正樂、王正泉、張樹華、于洪君、郭春生。

總編導：李荃、劉樹人。

該片是由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蘇共興衰與蘇聯興亡”課題組、中央紀委、中國方正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聯合攝製，解放軍藝術學院電視藝術中心承製，2006年6月出品。

論。”

我們感謝國內外學者、廣大觀眾和讀者對我們上述初期成果的鼓勵和厚愛；我們也深知，《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還有不少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解說詞的前面有一簡短的序言。這不足千字的序言實質上也是我們這本專著的引言，揭示了我們這部專著的主題和立意以及基本框架，特照錄如下：

20世紀90年代初，在人類歷史上，發生了這樣一件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蘇聯，這個有著2240多萬平方公里的橫跨歐亞兩洲龐大疆域的大國、強國，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頃刻之間解體覆亡。

震驚之餘，世界各國及政黨、相關國際組織、各類學術團體乃至不少個體，都在紛紛思考“蘇聯解體”這一前所未見的鉅大謎團，力圖借鑒這份不可多得的歷史遺產。

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從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學得的知識可能是進步的最有效的工具。”²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高度重視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毫無疑問，認真研究、正確認識這一重大問題，對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大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試圖向世人解讀“蘇聯解體”的原因：“經濟沒有搞好說”、“斯大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氏叛徒葬送說”、“外部因素決定說”，等等，等等。我們看見不同的人得出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² 莫蒂默·艾德勒、查理斯·范多倫編：《西方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66頁。

的結論。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³ 鄧小平同志在其 1992 年那個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⁴ 1991 年 12 月，江澤民同志指出：蘇聯東歐的變化，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2000 年 12 月，胡錦濤同志也指出：蘇聯解體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本片從以下八個方面對蘇共內部問題的產生、發展和變化展開剖析：一、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二、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三、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四、蘇共的黨風。五、蘇共的特權階層。六、蘇共的組織路線。七、蘇共的領導集團。八、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

我們這部專著與《居安思危 — 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八集 DVD 一樣，也是分八章，甚至連標題都相同。我們是這樣考慮其邏輯結構的：蘇聯解體有著多種原因，但蘇共的蜕化變質是根本的原因。我們這部專著和八集政論片都是圍繞這一根本問題展開的。

第一章：〈蘇共興衰的歷史軌跡〉，旨在通過回顧蘇共興衰的歷史過程，提出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這一重大而嚴肅的問題，初步剖析了亡黨與亡國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從而得出“問題就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的結論。如果說第一章是總論的話，那麼以後其他各章則是圍繞這一結論而展開的。

第二章：〈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旨在說明，沒有

³ 《毛澤東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322 頁。

⁴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380 頁。

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和運動；而錯誤的理論就必然會導致錯誤的行動和錯誤的運動。這就是理論的重要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講，蘇共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正確理論指導的結果，蘇共之所以亡黨，是從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逐漸脫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結果。黨的基本理論，只有轉化為黨的行動的綱領和指南才具有實際意義。任何一個政黨的基本理論，最終會轉化為這個政黨的工作指導方針；任何一個政黨的工作指導方針，也必然體現其基本理論之本質要求。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盡可能講清蘇共基本理論的同時，也適當聯繫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工作指導方針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第三章：〈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旨在說明，黨的理論是通過具體的意識形態工作去貫徹到全黨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工作是聯結黨的理論與黨的其他各項工作的船隻與橋樑，理應引起全黨特別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尤其是最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本章力圖通過蘇共這方面的經驗教訓說明：意識形態工作的各級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必須培養和壯大一支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工作者隊伍；必須建立一批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術研究機構和報刊、電臺、電視臺、網路等堅強陣地；必須有一套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正確方法等。

第四章：〈蘇共的黨風〉。這裡所說的黨風，主要是指以黨的性質和黨的宗旨為核心的大黨風，當然，也包括黨的一般的工作作風。如果說第二章〈蘇共的基本理論及指導方針〉與第三章〈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是講黨的指導思想，第四章重點在闡明必須堅持黨的性質和宗旨。如果這個黨保持了鮮明的工人階級性質，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個黨便是屹立在人民——“大地母親”上的力量無窮的英雄安泰，否則難逃失敗命運。

第五章：〈蘇共的特權階層〉。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階級及階層，主要是指經濟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的概念。任何社會的階級及階層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也就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階級及階層一旦形成，對一定時代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則必然產生反作用。任何統治階級及其階層一旦形成，則必然企圖進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於自己甚至企圖“終結”和固化一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從一定意義上講，蘇共中的特權階層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物質力量，甚至可以說是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正因如此，2001年，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所有黨員幹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⁵

第六章：〈蘇共的組織路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思想政治路線確定之後，黨的組織原則和幹部路線就是決定的因素。如果說第二、三章講的是黨的思想路線，第四、五章講的是黨的政治路線亦即階級路線，那麼，第六章便是講組織路線，其中包括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與黨的幹部路線，以及黨的監督機制。組織路線是執行黨的思想路線與政治路線的保證。

第七章：〈蘇共的領導集團〉。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也承認個人在歷史進程中可能發揮的獨特作用。英雄，總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民的意志，引領時代前進的步伐，帶領群眾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那些落後與陳腐勢力的代表人物，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歷史場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動員、凝聚社會上的反動勢力，阻礙、扭曲歷史前進的步伐，甚

⁵《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0頁。

至導致歷史的倒退。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歷史從來都不是一條筆直的長線，它是在各種勢力的比較、較量和爭奪中，在進步與落後的辯證運動中不斷向前的。一部充滿濃烈的大喜大悲色彩的蘇聯歷史，正體現了社會實現進步的複雜和艱難，而蘇共不同歷史時期的領導集團在蘇聯不同歷史時期的獨特歷史作用，不能不使人們進一步深思黨的領導集團在保證黨和國家前進方向中的關鍵作用。

第八章：〈蘇共對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戰略的應對〉。如果說，第二至第七章講的是蘇共興衰的內因，那麼第八章講的主要是蘇共興衰的外因。當然，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以上就是我們這本專著的主要框架，體現了我們對於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看法。

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一場鉅大的歷史災難

如何為蘇共亡黨、蘇聯解體這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場大災難還是一次大進步呢？前幾年，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其他國家，對這一重大問題都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一定意義上講，“好得很”與“糟得很”各不相讓。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13年，歐洲那些自稱“文明的”國家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成千種報紙、成千個講壇，用成千種論調以“愛國主義”、“捍衛文化”等幌子為擴大軍備尋找理由。針對這一現象，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公衆先生

們！別相信空話，最好是看看對誰有利！”⁶

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對誰有利，對誰是災難呢？

一是這一事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不要說我國的北京、上海等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遠的鄉鎮，大興土木的推土機、吊車隨處可見。2002年6月，筆者到俄羅斯訪問，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見轉動的吊車。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告訴筆者，現在要比此前衰敗的十年好不少。就這樣，還是有70%的國內外資本轉悠在莫斯科。你們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幾乎所有地方，都可以進一步體會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給我們國家、民族和人民帶來的嚴重災難。接著我們來到伏爾加格勒（原來叫斯大林格勒）訪問，從下降的飛機上即看到在寬闊的伏爾加河上高聳著九座大橋墩。下飛機後問前來迎接的州長，回答說這是通往哈薩克斯坦的一座鐵路橋，修通後對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很有好處。但因聯邦政府不給錢，1990年被迫停工。筆者接著問，二戰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業區，矗立在延綿80餘公里的伏爾加河兩岸。二戰中，這六大工業區被夷為廢墟。二戰後，僅用三年左右時間，又一座延綿80餘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這裡聳起。現在的主要建築還都是那三年建設的。那時有資金嗎？他說，沒有。筆者又問，三年左右時間，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時間卻建設不了一座新橋。這是為什麼？他沉默少許說：“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樣。那時，人們有信仰，有幹勁，餓著肚皮也幹。現在很迷惘：我們的過去錯了，將來要往哪裡走？我們一無所知！”隨後，我們代表團又來到俄羅斯遠東地區幾個地方，在那裡，可以明顯看出，衰敗得更為厲害。

⁶《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1頁。

為更好地完成“蘇聯解體與蘇共亡黨”這一課題，筆者數次親身瞭解考察蘇聯解體前後的俄羅斯，2003年10月筆者再次訪問俄羅斯。訪俄期間，筆者與俄羅斯社會科學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長談。他說：“俄羅斯近年來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質損失，無法計量。實際上，所謂的改革使俄羅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損失，無法估量”。在這次訪問中，我們獲得從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大約十年間有關俄羅斯倒退的不少具體資料，概舉如下：

(1) 經濟領域：國內生產總值急遽下降，現代工業大國變成原材料附庸。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衛國戰爭期間僅僅下降了2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了64.5%，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盧布貶值，物價飛漲五千多倍。一些現代化航空航天企業改行生產簡單的日用品。1990~2001年間，科技領域就業人數從250萬下降到80萬，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到美國、西歐甚至發展中國家工作。

(2) 社會領域：分化混亂、人口銳減。1989年10%最貧窮人口收入與10%最富裕人口收入為1比4.7，而1999年為1比近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無家可歸、流浪兒童、賣淫、愛滋病和性病等問題成堆。每年約有50萬婦女到國外賣淫。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趨勢。1990年，俄羅斯的平均預期壽命69.2歲，2001年男性預期壽命則為58歲。2001年，自殺人數已達四萬。人口每年自然下降近80萬。根據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結果，全國人口總數僅為1.45億人，比1989年減少兩百萬人。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2005年提供的資料，俄羅斯男子的平均壽命為58.6歲，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時男性平均壽命的63.4歲還低

4.8 歲，這使得俄羅斯成為全歐洲男子平均壽命最低的國家。⁷

(3) 社會治安：犯罪猖獗，罪犯逍遙法外。劇變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1990 年俄羅斯殺人案為 1.43 萬起，1998 年為 2.3 萬起，2001 年為 2.98 萬起，2002 年已超過 3.2 萬起。每年由於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十萬。⁸ 實質上每年有 20 萬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劇增加，每四個成年男人中，就有一個是前科。俄羅斯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平均每十萬人口有一千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針對平民百姓的犯罪非常猖獗，有組織犯罪甚至滲透到最高的一些權力機關，事實上社會現在處於全面的恐怖狀態。自由派要求用市場作為解決所有社會經濟問題的綱要，他們要求小政府，弱化政府，竭力削弱國家各方面的職能。自由派所說的“人權保護”實際上保護的是罪犯。

(4) 國家職能：嚴重退化。多黨制嚴重破壞其政治制度，貪污腐敗成風。每年用於賄賂的金錢高達數百億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動。國內到處都是政治公關，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聞傳媒往往把人民看作是操縱、欺騙的對象。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重大問題上，普通人民的意見被漠視，被排斥。國家缺乏經過科學論證的發展構想，缺乏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人們對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對政治領袖的失望在增加，對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 精神道德領域：社會盛行“叢林法則”。理想信念動搖、倫理觀念動搖，喪失了傳統的善惡觀念和區分是非的能力，社會

⁷ 〈俄大規模私有化導致失業，使成年男子死亡率上昇〉，搜狐新聞 2009 年 1 月 20 日 (<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0206.shtml>)。

⁸ 符·伊·多博林科夫：《全球化與俄羅斯：社會學的分析》，莫斯科 2006 年俄文版，第 339 頁。Добренков В.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ИНФРА-М,2006.С.339.

道德基礎惡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眾媒體向社會民衆傳輸西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只是為了巧取豪奪和追取個人的利益，從而造成俄羅斯的勞動倫理，熱愛勞動的品德也喪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惡混淆，世風日下、金錢惟上。許多青年不願從事勞動，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為銀行家、公共關係專家甚至嚮往罪犯、搶劫犯或者是敲詐者。一些大眾傳媒，一些電視和電視劇把犯罪和黑幫美化。在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精神道德危機下沒有出路的悲慘生活，導致了自殺這樣一種社會悲劇。1990年自殺人數達2.64萬人，1998年為3.54萬人，而2001年已經達到3.97萬人。

（6）國際地位：淪為二流弱國。為迎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俄羅斯放棄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俄羅斯在全面撤退，離開了世界許多地區，放棄了自己的盟友，其他國家迅速填補了空白，在獨聯體的地位也在弱化。

近幾年，筆者先後三次訪俄，無論是季塔連科、多博林科夫還是其他有識人士，在談到蘇聯解體、蘇共亡黨所造成的鉅大災難時無不痛惜萬分甚至淚光閃灼。

蘇聯部長會議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國悲劇》中也說：蘇聯解體“給俄羅斯造成鉅大損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種情況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經濟、國防能力、科學發展、生產和文化、居民生活水準等等。”⁹為說明這點，他從無數確鑿的事實中，僅舉1999年國家杜馬專門委員會彈劾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材料中的幾例。但這幾例卻用去整整近九頁的篇幅。雷日科夫在這九頁中說：“蘇聯統一經濟空間、國民經濟和科學的破壞，產生了近千萬的失業大軍”，“1998年的失業人口在超過2500萬”；“比較幸運的

⁹ 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372頁。

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則為 200~300 個家族據為己有，他們攫取了國家財富的絕大部分，同時也攫取了國家的權力”。¹⁰

二是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極大的災難與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歐國家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先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 1950 年開始，東歐國家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濟增長速度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讓我們看看劇變前蘇東主要國家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與主要歐美國家增長的對比。在 1950~1984 年間，蘇聯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 9.9 和 14 倍，保加利亞為 14 和 29 倍，匈牙利為 5.1 和 9.2 倍，民主德國為 7.6 和 11 倍，波蘭為 5.9 和 14 倍，羅馬尼亞為 17 和 38 倍，捷克斯洛伐克為 5.3 和 9.4 倍，而在 1950~1982 年間，美國國民收入、工業總產值則分別增長 1.8 和 2.1 倍，英國為 1 和 0.9 倍，法國為 2.9 和 2.9 倍，聯邦德國為 3.4 和 3.9 倍，義大利為 3.1 和 5.3 倍。¹¹

但 20 個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東劇變之後，使國外原有的 15 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十個國家改變性質或不復存在，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多民族聯邦制國家先後解體，世界上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總人數由原來的 4400 多萬銳減為一千多萬，且多數喪失了執政地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 年，在短短一年多裡，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六國，政權紛紛易手，執政 40 多年的共產黨或下臺成為在野黨，或改變了性質。緊隨其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於 1992 年 3 月在大選失敗後下臺；在南斯拉

¹⁰ 尼·伊·雷日科夫：《大國悲劇》第 374 頁。

¹¹ 宋則行、樊亢：《世界經濟史》下卷，經濟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第 111 頁。

夫，先是南共聯盟不復存在，原南斯拉夫聯邦內的各邦都發生了劇變，其後在經歷近一年之久的內戰後，最終分裂為六個獨立國家。伴隨共產黨喪失執政地位，東歐各國的社會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上，實行多黨制為基礎的議會民主；在經濟上，否定以公有制佔有主導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產大幅度下滑，持續的奔騰式通貨膨脹，嚴重的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人民實際生活水準大幅下降，使人們預期將在較短時期內實現繁榮和富裕的希望落空，為之付出的沉重代價卻遠遠超出事先的想像。

據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雜誌提供的資料，“1990~1993年，獨聯體國家生產總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亞美尼亞下降的幅度超過50%，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莫爾達瓦、塔吉克斯坦大約減少40%，烏克蘭下降30%多，烏茲別克和白俄羅斯比較穩定，只降低17%和24%。”¹²

東歐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從1990~1993年，羅馬尼亞下降20.8%，保加利亞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蘭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¹³

從劇變至今的近20年來，保加利亞舉行六次議會選舉，先後組建11屆政府，沒有一屆政府或一位領導人連任。現在，除煙草、鐵路、港口、核電站等少數經濟部門還掌握在國家手裡，70%以上的國有企業都被私有化，且大多賣給了外國人。97%的銀行已是外資銀行。在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人們健康狀況惡化，人口從原來的近900萬減少到現在的780萬，有100萬

¹² 帕·波·魯齊利娜：〈90年代獨聯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摘要）〉，《黑河學刊》1995年第2~3期，原載於俄羅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1994年第5期。

¹³ 小林、陳弘：〈東歐國家近年經濟狀況的一些數字〉，《俄羅斯研究》1995年第5期。

人（且大多是年輕人和有一技之長的知識分子）外流。社會兩極分化嚴重。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貧困。由於經濟處於停滯狀態，基礎設施陳舊，鐵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劇變前甚至是 50 年前建造的，房屋牆體剝落，路面失修，到處是一派破敗景象。¹⁴

我們再來看看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給古巴帶來的災難。20 世紀 70 年代，在經過前一時期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的探索後，古巴開始實行依靠“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國家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古巴與蘇聯實行經濟一體化，並於 1972 年加入經互會，發揮蔗糖生產的比較優勢，用蔗糖換取蘇東國家的工業產品，滿足人民所需的消費品和國家實行工業化所需的生產資料。古巴與經互會國家的貿易佔古巴外貿總額的 85%，每年從蘇聯進口石油 1300 萬噸，佔國家石油需求的 90%。與蘇聯的經濟一體化保證了古巴的經濟命脈，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古巴經濟年均增速 70 年代為 7%，80 年代上半期為 8%。¹⁵ 同時，古巴的社會建設事業也得到快速發展。80 年代末，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均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古巴與蘇聯的經濟一體化同時為古巴埋下嚴重隱患。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蘇東劇變幾乎摧毀了古巴整個對外貿易，美國趁機強化經濟封鎖。古巴遭受這一“雙重封鎖”的致命打擊，被迫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1989~1993 年古巴經濟萎縮 35%，¹⁶ 1993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 1989 年

¹⁴ 劉淑春、呂薇洲、馬細譜：〈蘇東劇變以來的保加利亞〉，《國外理論動態》2007 年第 9 期，第 53 頁；2007 年第 10 期，第 34 頁。

¹⁵ *Desarrollos Macroeconómicos de Cuba en las Décadas de los Años 80 y 90*（<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

¹⁶ “Informe Económico 1994”；Banco Nacional de Cuba；C. Habana；agosto de 1995；anexo 1.

的 66.1%。¹⁷ 直至今日，古巴尚未從“雙重封鎖”中完全恢復過來，走出“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語）。直到 2008 年初，菲德爾·卡斯特羅還在《起義青年報》上發表文章進一步表示說，蘇聯解體對古巴來說是“一個毀滅性打擊”。¹⁸

最後看看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給朝鮮帶來的災難。朝鮮自 1948 年建國以來，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1948~1984 年工業產值平均增長率為 17.3%。1984 年工業總產值相當於 1946 年的 431 倍，糧食產量為 1946 年的 5.6 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 65 倍，人均國民收入 1986 年達到 2400 美元。朝鮮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就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化學化，但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朝鮮也形成了依賴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石油的高度機械化的農業體系。蘇東劇變後，朝鮮石油緊缺，大部分農業機械嚴重閒置，使原來幾乎全部依賴進口的鉀、磷肥嚴重匱乏（朝鮮化工只生產氮肥等），導致農業危機，引發嚴重的糧食問題。儘管朝鮮並不是經互會成員，但原來朝鮮對外貿易的 70% 也是同蘇東國家進行的。蘇東劇變後，朝鮮經濟持續九年出現年均約 2% 的負增長，1995 年的經濟負增長率高達 4.6%。蘇東劇變使朝鮮對外貿易額從 80 年代的一百多億美元減少到 1997 年的不足十億美元。人均國民收入從 1990 年的 1064 美元降至 1997 年的 741 美元。¹⁹ 朝鮮現在經濟困難，無疑有其他方面的種種原因，但是，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和經互會的不復存在難道不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嗎？

¹⁷ Raúl Hernández Castellón: “SIGLO XX: BREVE HISTORIA SOCIOECONOMICA Y POLITICA DE CUBA”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

¹⁸ 埃菲社哈瓦那 2008 年 1 月 27 日電。

¹⁹ 孟慶義、劉蕾：〈朝鮮真實的經濟狀況〉，烏有之鄉網站 2007 年 11 月 6 日 (<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20/200711/26836.html>)。

三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民造成鉅大災難。

現在，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高出 330 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 1991 年的 7940 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三萬多億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四倍多。根據聯合國《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資料，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五百人的收入總和大於 4.16 億最貧窮人口的收入總和。由於蘇東實行的全面社會福利參照體系的坍塌，美國、瑞典、法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不僅所有制、分配、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右轉，就連已建立好的福利體系都在右轉。2005 年美國人報告的總收入增長了近 9%，但是社會底層 90% 的人的平均收入卻比前一年下降了 172 美元，即 0.6%。²⁰ 2000 年，美國貧困人口為 3160 萬，2001 年增加 130 萬，2002 年又增加 170 萬，達到 3460 萬。而到 2007 年則增至 3620 萬，其中有 2950 人靠領取食品券過活。²¹ 1980 年，英國達不到全國平均收入水準 40% 的人口為一百萬，而到 1999 年增加到了八百萬。²² 現在，法國有 25 個億萬富豪，卻有七百多萬個窮人，近 70 萬身負重債。²³ 從一定意義上講，起始於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閉而拉開美國金融、經濟危機從而引發全球經濟大動盪，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鉅大災難，也可以追根於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冷戰的結束，一國獨大的美國才敢也才能放手吹大自己的泡沫經濟。

20 世紀的人類歷史上，發生過三起與社會主義直接相關的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是俄國十月革命；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其中，前兩件大事是凱歌進行，給我

²⁰ 《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2007 年 3 月 29 日。

²¹ 〈美國貧困人口不斷增加〉，路透社華盛頓 2008 年 11 月 17 日電。

²² 劉志軍：〈全球化削弱人類安全〉，《環球時報》2006 年 5 月 2 日。

²³ 山南：〈法國陷入“集體性貧困”〉，《國際金融時報》2008 年 12 月 5 日。

們共產黨人帶來無盡的喜悅；第三件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則是最令人震驚、憂鬱、沉痛的事件。蘇共亡黨、蘇聯解體與 1871 年巴黎公社失敗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這是因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裡。那些扼殺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²⁴ 而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鉅大逆流、災難和反動，人類歷史發生的大曲折、大逆轉；葬送蘇共和蘇聯的叛徒們也同樣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我們黨的幾代領導集體多次反復強調反面教員的獨特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五萬餘人的鮮血，便沒有後來的遵義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乃至人類歷史上這一重大災難，我們便不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艱辛與壯烈，因而也反襯不出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雄偉與瑰麗。當然，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五萬餘人的犧牲與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雖同為悲劇，但屬於兩種不同性質的悲劇。雖然從對革命造成重大損失這一點上看，不存在誰比誰好、極“左”比極右好的問題，但畢竟是屬於兩種不同性質的悲劇。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湘江戰役五萬餘人的犧牲畢竟是仍要革命的問題，而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則是對革命背叛的問題。二者在這點上無疑有著原則的區別。在今後社會主義運動的征程中，我們無疑要繼續警惕犯過去“左”的錯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在糾正一種傾向的同時，

²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81 頁。

也要警惕被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的產生——注意右的錯誤思潮的發生。因此，對蘇聯解體、蘇共亡黨這一重大歷史現象進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訓，對加強我們黨的先進性建設乃至全人類解放事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

蘇聯和蘇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裡？正如以上所述，各種觀點雜陳紛爭。隨著國內外學術界對蘇聯劇變研究的不斷深入，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烏托邦說”、“病態早產說”、“經濟沒有搞好說”、“軍備競賽說”、“民族矛盾說”等等逐漸在我國媒體上消褪，但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說”的觀點卻仍有相當的影響。

幾年來，我們“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課題組經過認真分析，研究探討，大家逐漸達成共識：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所致。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²⁵ 這是偉大列寧的名言。讓我們首先對“斯大林

²⁵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頁。

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及其相關問題作點具體分析。

第一，對“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分析。我們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分為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的管理體制機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都籠統地稱為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加以全盤肯定或否定。當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與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其中包括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它們又有著本質的區別。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國體；而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在方向確定以後的實現這一方向的具體辦法，是解決“如何為、怎麼為”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的政體。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俄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成功地進行了十月革命，並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說到底，堅持並不斷完善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確保人民當家作主，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漸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實現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真正的蘇聯共產黨人，對列寧開創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應該也只能是堅持、鞏固和不斷完善、發展。同時，對這個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所體現的具體形式即運行體制則應以國情的不斷變化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及時進行調整改革。列寧和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以及體現這些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並不斷變化著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基本上是符合蘇聯國情的，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鉅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我們應當看到，由於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進行建設還沒有經驗，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論觀點和個人作風

等種種原因，蘇維埃政權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也存在一些問題的。比如，二戰結束和戰後恢復重建任務完成之後，沒有及時對 20 世紀 30 年代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現個人迷信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原因之一，但這決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結果的必然。我們決不能從隨著形勢發展變化需要對蘇聯具體管理體制機制的改革中得出對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全盤否定的結論；更不能把具體管理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都不加分析地歸結為基本制度的問題，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進而得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一些同志所說的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其實質是把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頭上。這一說法的實質，與“烏托邦說”、“病態早產說”沒有本質的區別。

第二，對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管理體制機制的分析。毛澤東曾說：“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麼東西有 20 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後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

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²⁶ 運用毛澤東分析斯大林這一方法論，來分析蘇聯所建立的具體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無疑也是適用的。鄧小平同志對“蘇聯體制”也是採取具體分析辯證的態度的。1957年4月，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這幾年搞得比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蘇聯的經驗”，“我們要繼續學習蘇聯，還要會學。學習蘇聯好的東西對我們用處很大，借鑒蘇聯錯誤的東西，對我們也有很大的益處。”²⁷ 我們認為，鄧小平同志這裡說的蘇聯的經驗和錯誤就包括蘇聯管理體制機制。這就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雖有一些弊端，但總體上是符合蘇聯20世紀30~40年代所面臨的世情和國情的，適應了當時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包圍的情勢和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體現了共產黨對國家人民的領導，使得蘇聯取得了工業化、衛國戰爭和戰後重建等偉大勝利，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具體的管理體制機制的確存在一些弊端，但總的說來，它適應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要求，有利於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優越性，成績是主要的，弊端是次要的。我們決不能因為斯大林時期具體管理體制機制存在一定弊端而對這套管理體制機制全盤否定。

第三，對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沒有及時進行改革的分析。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經過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各個階段的體制變化和差異也極大。把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²⁶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1頁。

²⁷ 《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3~264頁。

歸咎於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體制的觀點，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正如前所述，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所建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總體上是符合蘇聯 20 世紀 30~40 年代所面臨的世情和國情的，特別是適應蘇聯戰時需要和戰後恢復重建任務的需要的。但隨著二戰勝利和戰後恢復重建任務的完成，這個體制總體上就無法進一步適應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顯現，這就需要對其及時進行調整或改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學習借鑒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就採取了科學分析的態度，並開始對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其中包括經濟政治體制的探索。鄧小平同志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同時，繼續對這個體制進行改革，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而在蘇聯，在戰後重建任務基本完成以後，卻沒有及時對其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機制進行改革，筆者個人認為，斯大林本人有認識不足之責任，同時也有晚年多病、體力不支這一重要的原因。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臺後，試圖對此進行改革，不可否認，他們也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問題在於隨著條件的變化，赫魯曉夫領導集團沒有及時和正確地領導改革，反而將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漸演變成對蘇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否定，這就為日後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大山般的倒塌開掘了第一鋤也可被稱之為關鍵性的第一鋤。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打著改革的招牌，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如果無視從赫魯曉夫以來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的蘇共領導集團所犯的錯誤，而將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時期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在歷史上根本站不住腳的。

第四，對人與體制機制的相互作用及其關係的分析。1980 年

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²⁸ 主張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主要原因在於蘇聯僵化的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這兩段話，來佐證自己的觀點。但是，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在於僵化的蘇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忽略了鄧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關論述。比如，1992年1~2月間，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說：“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他又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²⁹ 他還說：“只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什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³⁰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完整

²⁸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頁。

²⁹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

³⁰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

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³¹ 他說：“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³² 這就為我們辯證統一地正確理解鄧小平在不同時期不同論述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指導。這也就是說，我們同樣需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而不能各取所需，僅抓住其中的一兩句話，不顧時間、地點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闡發。

讓我們再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層面，來看看人與體制機制之間的辯證關係。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社會生產關係各個方面的總和則組成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人是生產力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當然，人這種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不僅僅直接體現在生產力的範疇，而且相應地體現在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與上層建築相適應的社會意識等範疇中的方方面面。而體制機制則是社會上層建築的有機組成部分。體制機制靠人來確立和完善，也要靠人來遵循或變革。所以從根本上說，人決定體制機制。這就是鄧小平晚年所說的“關鍵在人”的道理。當然，一定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會反作用於一定的生產力與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關係，體現在人與體制機制的關係上，就是體制機制在一定條件下反作

³¹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頁。

³²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

用於生產力其中包括人。這種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筆者認為，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所說的：“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結論，其實質是在包括正確總結1991年底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重大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做出的，這一結論也完全適用於剖析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其黨內問題也是各種各樣，體制機制僅是其中之一，並且僅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這一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在黨內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具體運作方式和具體表現形式。一定的體制形成以後當然會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但歸根到底根本的問題還在於，確立和貫徹一定的體制機制要靠一定的理論來指導；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有了錯誤的理論指導便一定造成錯誤的行動。能進行理性和理論的抽象思維，則又是人區別於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種包括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特殊表現。從這一點上講，我們又找到了人決定體制機制的具體的表現形式。因此，我們認為，蘇共最終的垮臺，其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於體制機制，而是在於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致。在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過程中，作為領導集團的代表人物——從赫魯曉夫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等人難逃干係。我們至今仍堅持這一觀點。江澤民同志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

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³³ 這番話說得真好。

2008年2月1日，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八年執政步入尾聲之際，《俄羅斯報》記者採訪了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通訊院士戈爾什科夫，記者讓其談談今後若干年俄的發展需要什麼類型的領導人。這位所長說：“看來，應當重提‘對社會的科學管理’這一術語。它因為被我們視為過於意識形態化，長期一直羞於提及。現在，我們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有關‘幹部決定一切’的觀點”。³⁴ 幹部決定一切，從實質上回答了人決定體制機制這一命題。應該說，這實質上也是俄羅斯學者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新認識。

第五，對西方提出的“斯大林模式”進行分析。蘇聯在列寧和斯大林時期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其中不斷與時俱進的具體管理體制機制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蘇聯的實踐。實踐證明，這一制度，是符合蘇聯實際的，並取得了鉅大的成功。但西方的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卻把這一制度諡之為與希特勒法西斯並列的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他們不僅把列寧、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都稱之為所謂最殘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他們在分析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根本原因時，對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直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的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導致國家混亂、民族分裂的嚴重錯誤不置一詞，卻把這一罪過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寧和斯大林身上。1998年，戈爾巴喬夫在總結蘇共垮臺、蘇聯解

³³ 《江澤明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頁。

³⁴ 〈普京執政八年，沒有顛覆而是改造了俄羅斯〉，《俄羅斯報》2008年2月1日。

體的根本原因時，就明確歸結為“在於所選擇的那個‘模式’……這是布爾什維克還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個主要錯誤。”³⁵ 還應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不僅明確地使用了“模式”這個提法，而且也明確地把矛頭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寧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就為我們判斷他們所說的斯大林模式實質上決不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黨和中國黨從未採用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英國學者休·塞頓~沃森於 1953 年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詞，使用“模式”一詞來說明社會主義是西方的習慣用語。蘇聯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 1987 年才開始出現“社會主義模式”這種說法的。可以說，“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時，便被加上“極權、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於“法西斯制度”，實質上已被巧妙地納入西方企圖消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整體戰略之中。因此，我們不贊成“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因為這一不小心就極容易落入西方話語體系的陷阱。在本書中，有時也出現這種提法，但這僅僅是為了行文的簡便，並不意味著我們贊同西方的觀點。

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在於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張追究所謂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機制實質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的責任，卻不主張追究從赫魯曉夫直到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責任，但在追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責任的同時，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個人責任。他們在追究斯大林個人責任時，又往往集中在 20 世紀 30 年代兩件大事上：一是斯大林中止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實行農業集體化；二是肅反擴大化。有文章說：“全

³⁵ 徐葵等譯：《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 2002 年，第 20 頁。

盤集體化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30年代大鎮壓動搖了蘇聯執政的基礎。斯大林對此要負主要責任。因為這兩大運動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體討論的情況下就發出方針性的指令的。”我們認為，這一觀點，與歷史事實不符。

按照列寧的設想，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國家本想用最適合當時俄國國情的方法，盡可能逐步地過渡到新的社會經濟關係，但是俄國資產階級不同意做任何讓步，不接受國家調節生產和監督生產，並很快發動了威脅蘇維埃政權本身存在的殘酷的國內戰爭。外國帝國主義干涉者也與俄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企圖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寧說，資產階級只要“還有一線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戰爭來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他們就不可能也不應當接受蘇維埃政權為了用比較漸進的辦法過渡到新制度而對他們作出的局部性讓步”。³⁶ 因此，“我們進行殊死的無情的鬥爭，因而我們對舊關係的破壞比原來設想的要徹底得多。”³⁷ 因此，蘇維埃國家不得不實行為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所特有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這些政策，完全符合當時與國外干涉者和白衛軍作鬥爭的實際，有力地維護了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國外干涉者和白衛軍在反抗和撤退中，肆意破壞工廠、礦井、鐵路運輸、農具和農業建築物，還趕走了牲畜，運走了糧食等。到1921年春，俄國內經濟和政治形勢更加困難。農民對餘糧收集制十分不滿，軍隊中也發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亂。在此情勢下，列寧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深刻總結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是一次偉大的

³⁶ 《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4頁。

³⁷ 《列寧全集》第42卷，第223頁。

革命實踐和探索，也是一次偉大的理論創新。這對於發展生產力、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具有普遍借鑒意義。

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進入社會主義的一個入口，向社會主義過渡需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迂迴道路”。新經濟政策實質上就是從俄國小農佔優勢出發，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和掌握大工業的前提下，向社會主義的迂迴過渡，包括通過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實現這種過渡，其目的是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推進社會主義建設。

列寧指出，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必須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他強調，實行新經濟政策，無產階級要牢牢掌握政權，不僅要而且一定能夠防範和克服資本主義的消極影響，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因此，要認清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應當把握好以下幾點：一是1921年，俄共（布）開始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行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恢復自由貿易、實行租讓制、租賃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這是俄共（布）從實際出發，對在當時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探索，並對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二是新經濟政策是為了進攻的退卻。“我們現在退卻，好像是在向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先後退幾步，然後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³⁸ 因此，不能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目標，不是主張無止境地退卻。三是新經濟政策是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的政策，不能是利用資本主義來搞垮社會主義的政策，它是無產階級堅定的階級政策，

³⁸ 《列寧選集》第4卷，第732頁。

而決不是實行階級調和、取消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政策。四是實行新經濟政策，必須善於使自己掌握的國家按照人民的意志來行動，也就是說必須要把握好方向，只有道路走得正，才能達到勝利的彼岸。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過程，是列寧對社會主義不斷進行探索和重新認識的過程。他依據新的實踐不斷檢驗、糾正已有的理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有了嶄新的理解。這些新探索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的認識，形成了列寧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構想的整體框架，從而為其他落後國家開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提供先行的探索和有益的啟示。鄧小平對列寧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給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³⁹ 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有可能是經濟比較落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消除了外部強大敵人武力直接威脅之後所應該採取普遍性政策。筆者認為，鄧小平所說“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正是從這個更為廣闊的空間與視野上所說的。

蘇聯農業集體化開始是由列寧提出的，聯共（布）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做出了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決不是斯大林未經政治局討論而做出的個人指令。在聯共（布）十五大上，關於集體化問題的報告是莫洛托夫作的。⁴⁰ 蘇聯的權威著作《蘇聯通史》是這樣記載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為農業集體化的代表大會載入史冊。”⁴¹ 即使是在1929年以後加快農業

³⁹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

⁴⁰ 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453頁。

⁴¹ 安·米·潘克拉托娃：《蘇聯通史》，三聯出版社1980年，第592頁。

集體化進程的時期，農業集體化的重大決策也是蘇共領導集體決定的。1930年1月5日，聯共（布）中央集體通過了《關於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支援集體化建設的辦法》的決議；⁴² 1930年3月14日，聯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決議。⁴³ 這些都是黨中央集體的決定，不能說是斯大林個人的“指令”。

有人說，“全盤集體化極大地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事實卻是：沙俄在1913年的穀物產量是48億普特，而蘇聯在1937年已增加到68億普特，⁴⁴ 1958年是85億普特。⁴⁵ 蘇聯農業生產下降，有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出現的失誤，也有兩次世界大戰嚴重破壞這一十分重要的原因。我們還應看到，蘇聯通過農業集體化在短時間內完成了西方老牌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同時避免了它們“羊吃人”、“血與火”的掠奪與戰爭的罪惡。這怎麼是“破壞蘇聯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呢？

30年代鎮壓破壞蘇聯制度的敵對分子的決策也是聯共（布）中央的集體決定，不能說是斯大林個人的“指令”。儘管有嚴重錯誤，但肅反本身則是必需的。列寧、斯大林的戰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談話中仍然堅持：“黨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則。”⁴⁶ “我對這項政策負責。……犯過嚴重錯誤，也有過火行為，但是，整個政策是正確的。政治局全體成員，其中也包括我，對錯誤都有責任。”⁴⁷

⁴² 鮑·尼·波諾馬廖夫等編：《蘇聯共產黨歷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4頁。

⁴³ 鮑·尼·波諾馬廖夫等編：《蘇聯共產黨歷史》第471頁。

⁴⁴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9頁。

⁴⁵ 鮑·尼·波諾馬廖夫等編：《蘇聯共產黨歷史》第744頁。

⁴⁶ 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第467頁。

⁴⁷ 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第470頁。

就肅反擴大化問題而言，這是個悲劇，令人痛心。但肅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原蘇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總要誇大斯大林時期迫害致死者的數量，如 2000 萬、2500 萬甚至 4500~5000 萬。但據 1954 年蘇聯內務部起草的給赫魯曉夫的報告：1921~1941 年，因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有 64 萬多人。⁴⁸ 據 1990 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佈數據，1930~1950 年間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為 377 萬多人，其中被處決的為 78 萬多人。⁴⁹ 根據葉利欽後來簽署的《為政治鎮壓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間被鎮壓的人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能平反。⁵⁰

稍有尊重歷史的態度的人，都會承認斯大林時期的鉅大成就。對於斯大林時期的問題也要歷史地看。就蘇聯的工業化、集體化而言，它是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包圍下，沒有任何外援的條件下啟動的。統計資料表明，1937 年的工業產值已經相當於 1933 年的 2.2 倍，相當於 1913 年的 5.9 倍。通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蘇聯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工業化國家。毋庸諱言，工業化過程中也出現了過分剝奪農民、對富農曾採取過火政策等嚴重損害他們利益的問題。這些代價換來的是，蘇聯打敗了法西斯、社會主義政權得到鞏固的鉅大成就。當然，快速工業化的急迫性，帶來了當時有些政策的強制性。

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之人，斯大林也是這樣。斯大林犯過特別是後期犯過某些嚴重錯誤，如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在肅反工作中，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

⁴⁸ 吳恩遠：《蘇聯史論》，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第 120 頁。

⁴⁹ 吳恩遠：《蘇聯史論》第 117、121 頁。

⁵⁰ 參見吳恩遠：〈蘇聯“大清洗”問題爭辯的癥結及意義〉，《歷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76 頁。

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但我們也應看到，斯大林的錯誤雖然對蘇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但他領導蘇聯實現了工業化、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並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不僅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且也說明了他畢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的錯誤與他的成績相比較，只居於第二位。總之，要把那個時期的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考察。辯證地對待和分析斯大林時期和斯大林體制的成就及存在問題。既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盤否定。因為有問題就全盤否定那個時期的實踐，這在客觀上給敵對勢力反共反社會主義製造了藉口，這是令仇者快、親者痛的事。

近幾年，筆者三次訪俄，曾與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作了幾次深談。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對筆者說：“把蘇聯送入停屍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災難為慘痛代價，成為耶穌，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是蘇共黨員，現在仍保留著黨證。但蘇共垮臺時，我也是抱著歡迎的態度。十多年來給國家、民族帶來的鉅大災難，使我對我們國家和民族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

2002年，筆者在俄羅斯訪問並與俄各界人士交談時，其中出了這麼一個題目：“以對國家或民族的貢獻為根本標準，如果滿分為十分，你分別為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各打多少分？”筆者共訪問29位人士，其中有州長、市長、大學校長、醫生、企業電工和會計、飯店保

安等，從訪談的結果看，絕大部分對列寧和斯大林有極高的評價，而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評價較低甚至極低，有的甚至說“應處以極刑”。

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說過：“我知道，我死後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颳走。”⁵¹ 可以說，現在，這一歷史的風，已經起於青萍之末，今後一些年，必將拂掠於青萍之上。

四、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蘇聯劇變的原因及教訓

什麼是歷史？歷史由時間與空間組成，是相對於現在的過去式時空的存在。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們所讀的叫著“歷史”的課本或書籍，僅僅是歷史中特定人物的記憶或記錄或認識。這些記憶或記錄或認識是不是歷史的本來面貌，揭示的是不是歷史的本質和規律，需要認真地分析與甄別。恩格斯在 19 世紀 80 年代就指出：“資產階級把一切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著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⁵² 1889 年 10 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做……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⁵³ 因此，要獲得對撲朔迷離

⁵¹ 費·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奧爾馬出版社 2000 年，第 396 頁。

⁵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573 頁。

⁵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第 283 頁。

的現象的本質認識，就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做具體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研究。從本質上說，由於每個社會各個方面的人士所處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他們會對同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結論。在根本利益有著完全不同的群體存在的社會裡，對顯而易見的最基礎性的社會問題，常常會有著完全不同的對立答案。列寧曾引用這樣一句格言：“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⁵⁴ 因此，在人類實現大同以前，由於人們的認識不同，特別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的結論，總會有不同的陳述甚至激烈的爭論，不要企求也決不會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沒有完全的統一定論，就永遠沒有一個正確的結論呢？不會的，相對論在歷史的長河裡是站不住腳根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包括黨員學者始終不變的價值觀。因此，我們只能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來研究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如果站在其他立場特別是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立場上來研究，就不可能得出與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結論來。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讀，本質上都直接或間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場。

二是一定要用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來判斷。我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裡所說的實踐的前面省略了

⁵⁴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頁。

“社會”兩個字。這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實踐決不是個別人、個別政治集團或社會集團在短時間內的實踐。這裡所說的實踐，其主體是指億萬人民群眾，其時間是指一定的歷史跨度。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始終不變的真理觀。有人總是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聯的體制。讓我們來看看實踐中的事實，就不難做出正確的結論。大家都知道，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始建立於20世紀20年代末期，從那時起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內，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是做不到。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後，蘇聯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後，這些產品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當然，這也不等於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實踐在繼續，認識也在繼續。再經過數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我們有更加充足的信心，會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教訓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上午9點至下午2點多，在莫斯科我國駐俄羅斯使館，筆者與俄國歷史學家羅·亞·麥德維傑夫整整談了五個多小時。他說：“2001年9月11日，是赫魯曉夫去世30週年。為瞭解人們對赫魯曉夫的感情和評價，一大早，我就趕到新聖母公墓赫魯曉夫的墓地。我從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來祭奠，但全是赫的親屬，其他外人沒有一個。這能反映現在俄羅斯的人們對赫魯曉夫的評價。而列寧、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都

有人紀念。”筆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會實踐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馬克思主義認為，現象是本質的外部表現，本質是現象的內部聯繫。有時候，現象徹底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部分地反映本質；有時候，現象則徹底地掩飾本質。因此，我們要認清事物的性質，僅憑直覺和感性認識不行，必須透過現象，上昇到理性思維，這樣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與規律。馬克思在論述 1848~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時說：“1848~1849 年的革命編年史中每一個較為重要的章節，都冠有一個標題：革命失敗！在這些失敗中滅亡的並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傳統的殘餘”。⁵⁵ 同樣，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這樣的結論，在 1991 年前後的蘇東劇變中：1、失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對西方惟馬首是瞻的另一種教條主義。2、失敗的不是社會主義或“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失敗的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亦可說失敗的是社會民主主義。3、失敗的不是真正和原來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蘇聯共產黨，而是自赫魯曉夫始逐漸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的、從本質說已經完全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說，其在理論上的錯誤，主要是僵化、教條。但對自赫魯曉夫始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共產黨來說，從形式和表面看，雖然也有不少僵化與教條的東西，但其本質已經開始並逐漸乃至最終的完全改變。

當然，戈爾巴喬夫也曾號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可以回顧歷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世界各國有數十個集團和派

⁵⁵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376 頁。

別都以“社會主義”自詡，然而歷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甚至在更少的時間內，很快地就揭露了它們的原形。對戈爾巴喬夫原形的揭露，則是在更短的五三年之內。判斷任何人們任何政黨的實質，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們自己給自己取的響亮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麼。僵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以說，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因此，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也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包括斯大林時期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上臺起，蘇聯共產黨已經開始逐漸變質。特別是到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後期，儘管當時黨的上層仍有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等一批竭力反對戈爾巴喬夫集團的領導人；下層也有很多要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普通黨員，但從整體和本質上說，此時的蘇共已經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此時的蘇共，亦非彼時的蘇共了。所以，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蘇共垮臺，亦不是原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蘇共垮臺了，而是已經蛻變為社會民主黨亦即資產階級政黨的垮臺。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開始脫離、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蘇共垮臺，是值得慶倖的大好事。它以這一血的教訓告訴世人，對於任何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來說，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脫離、背離、背叛不得。這個自赫魯曉夫始開始脫離、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蛻化變質的“蘇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這樣的主義、政黨不及時失敗、垮掉，蘇聯人民可能會進一步延長自己的陣痛。要深入研究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原因，就必須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和真假共產黨

這樣一些基本概念。只有這樣，才能有助於我們抓住問題的本質。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表象地認識事物，若如是，則會像盲人摸象一樣，各執一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有多種原因，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類：一是外因，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和對其軍事威脅與爭霸。二是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出現的失誤和弊端。三是自赫魯曉夫始對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群眾的脫離、背離乃至戈爾巴喬夫的最終背叛。以上三類原因中，第三類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並是決定事物性質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在分析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時，抓住了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領捋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確認識因果關係，不要倒因為果，也不能倒果為因。唯物辯證法認為：1、任何結果是都是有原因的，沒有無原因的結果。現象的因果聯繫是客觀的、普遍的。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原因的唯心論、不可知論以及無所作為的思想，都是不對的。無論是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中，一個重大事件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原因所形成的結果。2、原因和結果的聯繫，不僅是客觀的，而且是辯證的。原因與結果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原因與結果，首先表現為它們的對立性、排斥性。比如，蘇共這個執政黨黨內出了問題，是這個原因引起了蘇聯的經濟沒有搞好、民族矛盾衝突、對美爭霸等等。而決不能倒果為因或倒因為果，說是由於經濟沒搞好等而黨內出了問題。其次原因與結果又表現為它們的統一性。它們相互依存，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比如，事物具備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條件，就必然產生一定的結果。1991年前後蘇聯所收穫的“盛怒於土囊之口”的劇變“風暴”，正是蘇共二十大播下的全盤否定斯大林之風並不

斷發展的結果。蘇聯黨內特權階層的出現，既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集團開始背離、背叛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的結果，又是人民群眾對蘇共進一步喪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終從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錯誤路線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對事物的認識最終上昇到理論，上昇到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蘇東劇變的重大事實，迫使我們必須對其歷史做一番新的研究。這就需要在理論方面做許多工作。因為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實中找到正確的答案。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從一定意義上講，可以看到這樣一條明顯的脈絡：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出在蘇聯共產黨黨內，黨內存在問題中，理論上的問題是發端。理論上出現問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理論素養，理論上素養的低下則必然導致其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動搖。綜觀蘇共歷史，列寧是堅定、清醒而又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時期黨的理論出現過問題，但所出的問題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到赫魯曉夫時期，黨的理論開始發生質的變化；從赫魯曉夫到勃涅日列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逐步完成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的脫離、背離、背叛，所以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

前些年，筆者與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交談，向他請教蘇聯解體的原因。他說：“蘇聯解體前後，我正好在莫斯科。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筆者不解。他又解釋說：“試想，保羅二世今天宣佈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將是什麼模樣？！”應該說，他講得很有道理。

說蘇聯演變的發端，是來自蘇共黨內的理論。那麼，這是不是說，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該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

尋找呢？不是。馬克思主義明確告訴我們：要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這裡就有三點分外值得注意：一是蘇聯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她是在舊俄基礎孕育、突變而來。舊俄一方面遺傳給蘇俄一定的生產力、資金和特定社會環境，從而規定其一定的發展並具有其特殊的性質。比如，無法跨越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以及贖買一些人的專長所必須實行的高額工資等等。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大的生產方式、生產體系的衝擊和影響。在戰爭年代，人們憑著堅定的信念，支持著頑強的奮鬥。在和平時期，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主動與被動打交道的過程中，儘管從綜合國力上蘇聯與美國可以比肩，但由於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謂的社會精英，產生對西方世界少數人佔有社會絕大部分財富的深深“愛慕”之情。三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強大的物質財富即金錢的衝擊。馬克思所說：“刺刀尖碰上了尖銳的‘經濟’問題會變得像軟綿綿的燈芯一樣”。⁵⁶ 恩格斯明確做出這樣的判斷：“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⁵⁷ 早在 1918 年 12 月，列寧〈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美國威爾遜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個俄國、整個印度以至整個世界都買下來。”⁵⁸ 列寧還指出，收買就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1920 年，列寧又指出：“資本主義現在已經劃分出極少數特別富強的國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誇大的計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們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這

⁵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543 頁。

⁵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第 647 頁。

⁵⁸ 《列寧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346 頁。

種大量的超額利潤（因為它是在資本家從‘自己’國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之外得來的）可以用來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即‘工人貴族’階層”，“現在則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不是軍事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這個現象的經濟根源，如果不充分認識這個現象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那麼，在解決共產主義運動和即將到來的社會革命的實踐任務方面，就會一步也不能前進”。⁵⁹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這些論述，令人深思。西方強國不僅用美元收買本國的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而且更加注重收買其他國家的“關鍵人物”。收買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據戈爾巴喬夫助手博爾金回憶說，戈在上臺後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帳戶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萬美元。⁶⁰ 2003年9月20日，筆者在莫斯科與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伊·麥德維傑夫交談時，他說：“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錢。我的一本厚書，在英國出版，得了兩千英鎊稿酬；在美國出版，得了一萬美元。據我所知，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三百萬美元的稿酬。葉利欽的第一本書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萬馬克；在英國出版，得了十萬英鎊。”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美元對蘇聯特殊階層的賄賂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買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徹底背叛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動力之一；“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在蘇共黨內的出現，也是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收買的結果。列寧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

⁵⁹ 《列寧選集》第2卷，第581~582頁。

⁶⁰ 瓦·博爾金：《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4頁。

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⁶¹ 從這個意義上講，“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們”是靠出賣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佔有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勞動的。以上三點，可以說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蘇共執政黨內產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經濟根源。經過理論的剖析，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史，同樣是一部階級鬥爭史，並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史。

五、從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中我們應當汲取的經驗教訓

第一，高度重視黨的思想理論工作。理論非常重要。理論正確，黨就堅強，政策就正確，思想就統一，經濟就發展，社會就穩定。反之，黨便渙散，政策便失誤，思想便混亂，經濟便停滯甚至倒退，社會便動盪。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運動。從另一角度來說，錯誤的理論必然產生錯誤的行動。正確理論是革命的先導，錯誤理論是垮臺滅亡的先導。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忽視理論。否則，或遲或早都會品嚐到忽視理論的苦果。

第二，最高領導權必須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的手裡，必須高度重視培養年齡結構合理的一批又一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從歷史唯物主義來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後果，都不是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是因為，人類歷史演進的最終原因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而不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賴以進行的歷史環境也對其產生作用，從而使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除此而外，每個特

⁶¹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

定的社會時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沒有這些人物，它也會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列寧和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及其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爾巴喬夫這個特定的人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於蘇聯，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純粹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但是，必然往往通過偶然開闢道路。蘇共二十大及其以後的社會條件，決定了這個時候不出戈爾巴喬夫，也必然會有其他的替代者出現。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人物；而歷史的逆流，則會推擁出逆動的人物。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是幾十年間蘇共黨內和社會上企圖在蘇聯最終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在蘇共黨內力量的代表。戈爾巴喬夫們和葉利欽們要最終在蘇聯消滅共產主義的動機，決不是其瑣碎的個人慾望，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所決定的。我們堅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會自己消除，光明也不會自動到來。兩軍對壘帥坐陣，從一定意義上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是其領袖間的較量。資產階級十分重視培養和選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們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更加注重培養和選拔我們自己事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才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推動歷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經過反復的艱難困苦的鬥爭，最終把逆歷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

第三，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揚民主，加強黨內的監督。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澤東主席在延安與黃炎培那段著名的談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⁶² 毛澤東關於人人負起責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而人人負起責來則是達到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徑，捨此別無它途。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事業惟其艱難，就是真正讓人人負起責來的艱難。全體黨員不論職務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黨章規定的直接或通過代表間接地處理黨內所有事務，其中包括確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權利。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講真話、實話、心裡話。這就是要保障黨員能夠按照正常的組織程序，充分發表不同意見。黨內對任何問題的討論，應該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從黨的利益和工作出發，就要允許充分發表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而在黨內真正形成敢說真話、暢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圍。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黨內團結，有利於行動的高度一致。那種壓制不同意見，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格格不入的。

第四，一切爲了群眾，時時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價值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億萬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我們始終不變的真理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動力觀。我們是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有機統一論者，是價值觀、真理觀和動力觀的有機統一論者。立場、觀點、方法，價值觀、真理觀、動力觀，全部有機統一到人民群眾這一主體上。我們深知，離開群眾，任何人、任何集團

⁶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 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第 719~720 頁。

和政黨，必然一無所成。群眾中的個體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乾涸，但一滴滴水匯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對於各種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歪風邪氣和錯誤潮流，群眾在一定條件下、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能為力，顯得風平浪靜，但在特定條件下，就有可能掀作鉅浪，翻江倒海。正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永久站立在人民這塊大地上，我們才能永久成為力大無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陰謀。從一定意義上講，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就是要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裡所講的，不僅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指，戰爭與和平各自獨立形態時內部的相互關係。巴黎公社革命，揭開了全人類解放事業的新篇章。但由於無產階級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沒有處理好戰爭問題，結果慘烈地失敗。無產階級深刻地汲取了這一教訓，此後，社會主義的蘇聯取得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社會主義中國和朝鮮、越南又先後取得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勝利。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無產階級在處理戰爭問題時，由於人民群眾和正義的強大力量，往往比較得心應手。但在處理和平問題時，即在對付資產階級的和平演變問題時，卻往往缺乏經驗。結果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樣重大悲劇的出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便宣稱：“‘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於國際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要“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⁶³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喬治·肯南和國務卿杜勒斯先後提出“和平演變”的理論。但美國當局重視不夠。美國在經歷主要運用“硬實

⁶³ 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華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力”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失敗之後，便進一步知曉“民主、自由、人權”等“軟實力”的重要性。這一轉折發生在尼克松政府時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第37屆總統。此時的美國在世界上30個國家駐軍一百萬，對全世界近一百個國家提供軍事或經濟援助。特別加上已陷入近六年的越南戰爭，使其財政經濟狀況逐漸衰落，國際收支發生危機，從而不堪重負。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職演說中說：“經過一段對抗時期，我們正進入一個談判時代”，“歷史所能賜予我們的最大榮譽，莫過於和平締造者這一稱號”，“我們邀請那些很可能是我們對手的人進行一場和平競賽”。⁶⁴此後的美國歷屆政府越來越重視對其“軟實力”的運用。這才有煌煌蘇聯的解體與龐大蘇共的垮臺。從此，美國各屆政府與其他各國特別是大國、強國打交道之時，便更加重視“軟實力”的運用。我們應當清醒認識，西強我弱局面有可能較長時期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將長期並存，有合作、有競爭，同時有激烈的較量。兩種制度的根本戰略目標不可能共贏。因此，我們在高度警惕西方在對我運用“硬實力”的同時，更應高度警惕對我運用西化、分化的“軟實力”、“巧實力”。我們還應特別注意到，在新的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軟實力”中“金融操縱”、“意識操縱”、“非政府組織滲透”、“信息干擾”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我們深信，俄羅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俄羅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故鄉絕對不會長久沉寂。蘇共垮臺、蘇聯解體這一鉅大歷史災難，必將以俄羅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新的鉅大的歷史進步為補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隨著

⁶⁴ 〈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職演講（譯文）〉，東方博客 2006年3月25日（<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生產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國際壟斷資本佔有這一全球範圍內的基本矛盾的日益加深，並有著蘇聯解體、蘇共垮臺這一難得的反面教材，歷史的車輪總是要馳過一個個帝國的廢墟，人類歷史必將在曲折的苦難中逐步迎來又一個絢麗多姿的春天。